浅谈城市规划的尺度：一座城市识别到多少人生活在其中？

——《城市发展史》读书报告

城市与环境学院 赵星光 1800013363

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总结过去、针砭当下、忧思未来，可谓倾尽其一生智慧。全书以于无秩序中诞生的聚落为起点，到先古时代的秩序高峰，而后途经中世纪的自由空气，再到丧失节制的巴洛克与恐怖的焦炭城，最后戛然停止在20世纪中晚期的特大城市。若说上述时间只是芒福德的叙事时间，那么其思想时间早已跨越孕育社会城市与生态城市的20世纪晚期，乃至到达构造多元城市生命体的遥远未来。

在上述进程中，无秩序与秩序在长期拉锯中逐渐界定出城市规划的两种方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长期以来，具有精英主义倾向的城市规划看重宏大叙事，讲究自上而下，而自下而上的细小叙事真正意义上被纳入规划范畴的时间不过百年。某种意义上讲，身为人文主义大师的芒福德意图在城市规划中再一次引入人的尺度——之所以说再一次，是因为这种人文关怀早已出现在早期聚落与中世纪初。

在本文中，笔者以《城市发展史》为主要书目，辅以其他参考书籍和一些亲身经历，对城市规划的尺度——尤其是这一尺度与人的互动——发表一些看法。

一 开始于人之尺度的城市

人从动物性中超脱出来走向文明的一大关键是聚落[[1]](#footnote-1)的形成。一个聚落能识别到所有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这在历史开始之初是一件再平凡不过的事情：居民们祭祀、从事捕猎与农耕、养育后代、驯化动植物[[2]](#footnote-2)，这些相互交叉的事务让每一居民成为聚落不可忽视的组分，聚落的结构因而也就围绕人的尺度展开。后世诸多乌托邦幻想尽管构思不一，但几乎无一例外都表达了限制人口的愿想[[3]](#footnote-3)。

聚落演变为城市后，识别所有居民的最初愿想被王权制度蚕食殆尽，仅有少数例外仍在历史浪潮中摇摆不定。以开创民主制度先河垂名的雅典，尽管其大部分居民以奴隶的身份过着隐形般的生活，但相比王权世界的其他城市，她以其独特的城邦体制、公共卫生制度、戏剧文化识别到了更多生活在其中的居民。那些不具备等级秩序的建筑架构，头一次让城市回归到聚落的初心。

无独有偶，中世纪的城市复兴或多或少与少数商人[[4]](#footnote-4)有关。当商人以其商业行为连结起沉寂了数个世纪的人际关系时，围绕王权运转、难以识别到多数居民的城市开始重新焕发生机。那些仅仅识别少数阶级的城市制度开始被迫识别数量更为广大的居民，既而引发制度本身的质变。

然而城市围绕人之尺度架构的时期在历史上不过寥寥数笔。更多时候，遗忘了人之尺度的城市，更像一台埋葬了无数生命的绞肉机。

二 遗忘人之尺度的城市

量变引发质变，当人口增长至突破界限时，人们选择用一定的自由换取秩序以谋求自由的底线与保障。矛盾在于，由王权带来的秩序往往在短期内成效卓著，又在历史怪圈中一次次化身为剥削自由的元凶。城市亦如此，当城市被统治者完全用于比拟宇宙尺度、再现宇宙秩序时，城市存在的目的在于维系其自身存在，她极可能难以看见生活在其中的诸多居民。

王权与紧随其后的教权的式微，并未让城市立刻重拾人之尺度，这源于城市愈演愈烈的排他性。高举自由旗号攻入伊斯兰世界的十字军[[5]](#footnote-5)视安拉城市的居民为披着人皮的魔鬼；莫尔的乌托邦人在土地不足时会肆意攻占邻邦的土地，雇佣兵的生命在他们眼里也不名一文。当一座城市的居民理所当然视其他城市的居民为非人时，没有任何手段可以保证他们不会将这种视角随时用在隶属同一座城市的他者身上。最初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城市分区、与实质是排除某些底层阶级的城市美化运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种排他性的变体。

如上，若要总结城市遗忘人之尺度的原因，笔者欲用“排他性”概括之——王权是将广大平民排除在享受大部分国家权力之外。以华丽风格和绝对秩序为主要特征的巴洛克风格是一种相对人道的排他，当城市规划者按照巴洛克风格规划城市时，他一定要视城市为铁板一块，如此才能反映某种总体秩序。总体最优——巴洛克风格下的最优甚至可能仅仅是形式最优而非其他意义的最优——并不能带来局部最优，大量的城市居民被忽视，城市规划的尺度变得大而无当。

相比巴洛克风格本身，巴洛克背后蕴含的某种秩序思想似乎更值得玩味，也更具争议性。芒福德极力反对城市巨型立交，认为其是巴洛克权力结构在今日世界延续的剪影。那些水泥迷宫让习以为常的安静成为稀缺社会资源，换句话说，生活在道路沿线的居民遭到了城市的某种忽视。这种忽视伴随着人文主义演进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哈尔滨松花江旁的城市高架路毗邻连片的居住区，城市选择用高耸的隔音罩阻挡噪声，诸如此类的技术手段在大规模基建设施与微小城市个体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当然，芒福德在晚期亦然反对城市的技术狂倾向，认为过分依赖技术的城市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割裂。隔音罩遮挡了噪声，但也使本就了无生趣的城市景观变得更加空洞，那些城墙般的架构仿佛把松花江畔拦腰折断。

从结果上看，城市巨型立交却是当下中国的某种妥协，倘若芒福德思想得以在城市发展之初就被引进，或许城市规划者会有不同的考量。而在长期高速发展后的今日，用芒福德思想阐述某些中国城市似乎不妥。几乎不存在立交系统的西安在晚高峰时段进城需要耗上两个小时，如此便不难想象倘若完全拆除北京的立交系统，这座文化古城会陷入怎样的交通瘫痪。但这是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诡辩？随着巨型立交的建立，汽车数量增长得更加肆无忌惮，城市规划被庞大基数所挟持，不得不选择性忽视某些居民，以换取城市的基本运行？

更激进的想，巴洛克权力思想的内核，似乎可以用来审视所有远超人之尺度的城市架构。数年前一项工程欲在长沙造出“天空之城”，其初衷在于以环保思想建造一座新的市民中心。然而这个世界第一高楼的设想由于种种原因延期，如今地基沦为鱼塘，其命运似同苏维埃宫。事实上，许多中国城市都曾试图打造地标，塑造亮眼的天际线。工程技术的部分偏执倾向悄无声息融入叠加的高楼里，让过高的楼层丧失其经济效率，使建筑成为单纯彰显城市权力的宣传机械。

如果说天空的尺度被限制，那么地下呢？芒福德对此依然表达了消极的态度。广州珠江新城的地下空间结构分明，从最底层的城市排水系统，依次向上搭建APM快速交通线、地铁3号线、地下商业区、行车道、地上步行区与景观花园。若用芒福德的观点来看，这种对地下空间的完全攫取破坏了城市的土壤组分，让城市的自然属性几近消失，那些建构在地表的景观花园不能安抚人们觉得与自然割裂开来的忧虑，反而阻碍了雨水的自然下渗。幸运的是，芒福德的生态城市构想得以在21世纪被具象化，并被赋予了一定的操作性。新加坡的海绵城市之路是一种可能的方向，其发达的水路网络将人造蓄水池、湿地、自然湖泊与生态洼地革命性的连结在一起，使这座花园城市成为一个更广大生态系统的有机组分。

在谈论如此多的巴洛克之后，还请回到关于巴洛克是一种相对人道排他的说法上。城市规划者选择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巴洛克的一些思想内核，这些思想内核的排他性随着文明进步而式微，其宏大架构是为了应对当今全球庞大的人口基数，笔者认为这是与芒福德思想有一定出入的地方。

而在面对另一种毫不人道的排他时，芒福德的思想值得每一个规划参与者认真审视。这种排他在封建时代与工业时代数次演绎到顶峰，随后以其顽强生命力苟活至今，但从未消弭。当斯诺医生奔走在伦敦街头寻找霍乱的零号病人[[6]](#footnote-6)时，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的自由空气大多早已被腐败的臭气所顶替，那些完全被城市所忽视的底层人，以前所未有的空间密度蜗居在狭小的街区里，几乎丧尽尊严——城市压根无法识别到这些人的存在。

上述丑态绝不是中世纪城市的专利，它们在工业时代后被“发扬”得更加露骨。专业化分工带来了大工厂的流水作业，带来了标准化的世界，也带来了被标准化同化与忽视的人。即使在今天，居住在富士康园区内的工人依然难以将业余生活与工作完全分割开来，因为住房就在厂房旁边，加班失去界限，工作逐渐成为生活本身。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面临的状况更加惨无人道，他们不得不把数口之家塞进狭窄破旧的标准化住房里，让自己成为城市机械的微小螺丝——切不要以为螺丝不可或缺，富足的剩余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未以人的形式被城市所认知。以相对激进的视角来看，在政策还不成熟的早期，中国的农民工为城市建设投入了大量血汗，他们却最终为其建设的城市所摒弃。那些不成熟的城市政策最终在结果上得到了好的修改，但任何修改背后都意味着上一代人的苦痛，这或许是城市规划者在修改任何规划时紧迫感与严肃性的来源之一。

除却用遮挡贫民窟等拙劣手段掩盖问题的部分城市，一批现代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重新回归到人的尺度上，他们不再拘泥于反映某种宏大秩序，不再作为少数人的艺术游戏，也不再理所当然的忽视部分城市居民，城市在人文主义语境下开始了新一轮的复兴。

三 重拾人之尺度的城市

当戴着黑框眼镜叼着烟斗的城市规划师形象，逐渐被深入社会角落的观察者形象取代时，城市规划某种意义上再一次向人的尺度靠拢。这种靠拢符合人文主义，却又需警惕沦为民粹主义或玄学。

芒福德的关注点并不在此：过分拥挤的城市首先想到的办法并无新意，人们纷纷逃向郊区，让城市横向扩展开来。乍一看这似乎是人向自然的回归，再一看这却是自然的灾难——梭罗在瓦尔登湖呼唤自然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为生存而烧掉了一整片森林。重拾人之尺度是目标，而城市则是前提，逃向郊区的人们让郊区空有城市之名而无城市之实，以至于当人们需要某项城市服务时，他们往往需要耗费更多资源来获取同等的服务[[7]](#footnote-7)。芒福德真正倡导的是疏解城市功能，将城市拆分成一个个具有一定功能的细小结构，进而形成一种符合生态要求的城市集群。想想北京正在做的事情：北京市政府逐步移往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力图实现非首都功能与首都功能的分离；总部经济、高新技术向雄安新区的转移进一步细化首都功能分区。城市逐渐开始为不同人群量身定做专属于其的区域，并搭配起相应设施。

这种功能分区与使人癫狂的专业化之不同在何处呢？这个问题或许并无边界，毕竟泰勒主义式的分工早已深入人心，模块化与集成化[[8]](#footnote-8)并行的产品建构决定了一定要有人从事单一的标准化生产。但无论如何，城市功能的分区仍然可以被视为综合考量后的结果，它不像标准化那样实现了无与伦比的自动化——如芒福德所说，人们应小心一切完全自动化了的事物——它恰恰需要人们不断交往、协调，于互动中不断界定新边界，以此来满足不同人之所需。通俗来讲，人们在城市功能分区中依然享有丰富生活的权利，即使是从事模块化生产工作的工人，他们的衣食住行照样为城市所识别，他们的声音也更加容易被他者听见。城市把一部分居民理所当然视为“工具人”的日子渐渐成为历史。

当芒福德提到城市的步行设施时，他为城市识别居民提供了另一种参考办法。汽车占据了大量城市空间，让买得起汽车的群体占用了宝贵的公共资源。而一个能为所有居民使用的公共空间，它往往是城市的步行区域。因此一个城市的步行区域某种意义上界定了城市规划的尺度。那些呈毛细血管状分布的羊肠小道、较高密度的城市住宅区和配套的步行街，让人们步行或骑自行车出行的理由变得更加充分[[9]](#footnote-9)。占地70万平方米的南京夫子庙步行区，约20公顷占地面积的成都春熙路，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的广州正佳广场 ，西安钟楼、塔楼、回民巷构成的2公顷步行区，它们无不例外拒绝了轰鸣的汽车，依靠着公共交通网络与人的双脚，构筑起为各自所在城市增光添彩的伟大区域。更有趣的人文关怀出现在日本，东京不同区的不同主要街道会在一定的时间里实行“步行者天国”计划，即把原本供车辆使用的道路暂时性的封闭起来，供步行者随意使用。如上的城市步行区域或多或少反映了城市的初心：城市是人们交流与聚集的场所，是社会、生态、政治、文化的交点。

综上所述，城市规划的尺度从来没有正确与否的说法，连合适与否都谈不上。芒福德对人文主义的呼吁只是诸多方向中的一种，但这个方向确实在城市的历史中被忽视了太长时间。一座城市能否识别到其中的居民，又识别到多少？识别与否的边界何在？哪些识别是人文关怀，哪些识别又是法西斯主义？诸多问题将留待历史解答或遗忘。

1. 思想来源于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footnote-ref-1)
2. 思想来源于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footnote-ref-2)
3. 思想来源于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footnote-ref-3)
4. 思想来源于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 [↑](#footnote-ref-4)
5. 思想来源于 维克多·戴维斯·汉森《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 [↑](#footnote-ref-5)
6. 思想来源于 史蒂芬·约翰逊《死亡地图：伦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 [↑](#footnote-ref-6)
7. 思想来源于 陆铭《大国大城》 [↑](#footnote-ref-7)
8. 思想来源于 安藤晴彦《模块时代》 [↑](#footnote-ref-8)
9. 思想来源于 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 [↑](#footnote-ref-9)